

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丛书

论公共德性

一项缘于上海城市社区
实证调查的研究

宋洁 / 著

ON
PUBLIC
VIRTU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论公共德性

——一项缘于上海城市社区实证调查的研究

宋 洁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公共德性：一项缘于上海城市社区实证调查的研究 / 宋洁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ISBN 978-7-5520-2753-2

I. ①论… II. ①宋… III. ①社会公德-研究-上海
IV. ①B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1055 号

论公共德性：一项缘于上海城市社区实证调查的研究

著 者：宋 洁

责任编辑：陈慧慧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0

插 页：2

字 数：142 千字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753-2/B·260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实证调查与培育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YJC710071)的研究成果。

序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学术专著,是一部基于实证调查所获得可靠数据之上的理论研究成果,其理论主攻标靶是公共德性问题。文献通过抽样选取上海20个城市社区的1000份青年样本开展相关研究。从他们对亲社会行为的不同态度选择出发,试图关照青年人对公共德性问题的理解与倾向性,在此基础上,揭示开展公共德性培育的有关要求和规律。

关于公共德性问题的研究,在本学界基本尚属于比较冷门的议题,至少不是热门话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则可能是由于这一话题的研究有难度,其中不仅有理论难点,而且有实践难点;二则可能是人们对这一话题研究的价值或意义还缺乏必要的认知。在这种状况下,宋洁的这本书居然知难而进,选择通过研究人们对亲社会行为的倾向性,转而研究人们的公共德性的培育问题,显然是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进取心的,对此我也十分钦佩和感动。宋洁的研究,最直接的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是阐明研究公共德性及其扩展为行为的重要性;第二是表明这种研究本身的特点。在阐明研究公共德性及其扩展的意义方面,本书紧紧围绕“公共性”这一内核展开诠释,可以认为,公共性是一个既可以作相对理解,又可以作绝对理解的概念。就它的绝对性而言,人类生活从一开始就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因为那时就产生了最原始的共同体,从而产生了为维系公共生活所必需的一系列规则、律令、禁忌甚至习惯等。尽管原始初民的共同体及其“公共性”要求相对粗糙,通行的领域与范围也十分狭小,但毕竟形成了一定的共同体及其“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存在是绝对的。同时,任何具体的“公共性”的存在又是相对的,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文明不断进步,人类的

共同体形态越来越丰富,直到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丰厚内涵的共同体形态,它所需要的“公共性”要求与原先的那些“公共性”要求相比,显然应该有更丰富的要素与要求,因此,“公共性”表现出明显的与时俱进的特征。对此,人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不能静止在某一具体的“公共性”之上,只能不断追求更“公共”、更共同、更普适的愿景,即没有最“公共”,只有更“公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社会共同体所拥有的“公共性”,其内涵与今天所说的公共性之内涵不可相提并论,但今天的“公共性”可能就蕴含着人类早期原始“公共性”的某些基因,它们也许就是从那里发育过来的。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公共生活的领域越来越扩展和深化,于是公共德性的内涵和通行范围也不断拓展,它们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或赞同。但公共性本身所具有的这种超越性,经常使习惯于固守、守成或自满的人们感到不适应,他们很难理解“公共性”具有永远没有终点的特征,即在一定的“公共性”之外,还有更大的“公共性”。就国人的思维习惯看,人们比较注重绝对化、格式化甚至凝固化,对“公共性”的认识也同样如此,因此需要认真考量推行公共德性和公共德行的必要性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人群长期以来只重视私德,而对社会公德,尤其是更广泛意义的“公共性”缺乏必要认知的情况下,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就更加彰显。

本书试图论述培育人们的公共德性,实际上点化出一个更重要的研究选项,即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丰富性及其复兴路径问题。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内容之一,“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宏伟奋斗目标已提出多年。但实际上人们对这一奋斗目标的具体理解还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人们至少在下面这点上已达成共识,即中华民族复兴的具体表征是多样化而非单一性的,是作为一个过程展现的而非一蹴而就的,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进程而非仅仅靠文字架构并主观臆想的产物。也就是说,就民族复兴的具体内涵来看,一个民族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更要在文化上强盛优越起来。不难看到,这些年来,人们对民族复兴的物质性内涵之理解比较重视,并且这些特征也比较容易被人们直观理解,而对民族复兴的精神特征和文化要素则考量甚少。甚至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梳理方

面,也常仅仅关注到有形的物质性需要,而对精神性和社会性需要之理解则欠缺得很。尽管我们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但实际上对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化和深入探究,还留有巨大的理论腾挪空间,尤其是如何将这些价值观内化为心外化为行,存在着许多值得探索的方面及问题。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我们究竟面临着哪些困难与挑战? 对于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况的大国来说,它在物质形态的发展中拥有什么特征? 是否永远也无法企及那些早发的现代化强国的物质水平? 然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人均物质水平上不如他国,并不意味着在精神特征和文化品位上就必然落后于别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精神方面做得比别国更有优势。不难看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前些年学界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一个重大障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这里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常常不指一个绝对值,而是依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相关国家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而定的一个区间值,如早些年一些南美国家的人均收入3000美元标志着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而现在人们衡量人均收入的中等水平则提高到了人均10000美元甚至更高,人均收入超过12000美元就可以列入高收入区间而成为发达国家。必须看到,考量人均收入水平是一回事,而计较社会特征更应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多年前,据说《人民论坛》杂志曾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社会特征的长期存在并不断深刻化,倒是应该引起人们的重点关注。如人均收入水平仅仅是个表象,社会的贫富分化严重才是社会危机的深根所在。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存在信仰缺失、精神疲软,奢靡浮华、逐利炫富,讲排场、比阔气,目光短浅等精神征候的话,这就比较可怕了。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和前途,并不仅仅应从其当下的物质富裕程度去考量,而更多应该从其精神征候和文明特征上去观察与判断。

记得当年有国人曾比较研究过世界上几大民族的文明特征和性格特征，他认为要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他甚至进一步指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纯朴；法国人拥有一种非凡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而中国人除了拥有深沉、博大、纯朴外，还拥有灵敏。^① 尽管我们今天不可以个人的观点作为作出整体判断的依据，但仍然可以追问，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国人，正以怎样的精神气质展现在世人面前？世人又会对国人作怎样的评价？

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国人加强自己的德行修养，已成为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近年来人们推崇王阳明的心学及其修养学说，即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人们的这种问题意识。

当然，本书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实证调研与理论分析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分离感，融合度不高。另外，实证调查问卷的样本不大，对于这么一个重要问题之研究对象，区区1000份问卷实属小型规模，这对描述问题的全貌势必会带来一定的缺憾，同时，由于问卷内容涉及的相关变量不够丰富，既有的一些变量又似乎都表现得与研究问题本身关联性不大，如性别、年龄、家庭状况、地域等都显示为“差异不明显”，还有一些变量如从事职业状况、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则没在问卷的相关性因素预设之中，也许会遗漏重要的干涉变量。

对于青年研究者的探索，我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至于对研究文献内容的具体评价，只有对其作一番认真而又客观的审阅后，才可能作出准确的评判。建议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人士，不妨读读这本专著。

邱柏生

2018年9月10日

^① 参阅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6。

目 录

序	1
导言 城市社区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发育：引发对公共德性的关注	1
一、亲社会行为：为什么人们助人？	1
二、公共德性：人的亲社会行为诉求	5
第一章 研究缘起：寻找公共德性——为什么一些人比其他人 更多助人？	8
第一节 时代召唤公共德性：城市社区亲社会行为中的公共 德性调查	8
一、调查设计与发放	8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0
第二节 亲社会行为的基本动机：助人动机层次模型	23
一、进化心理学：本能与基因	23
二、社会交换：成本与报酬	24
三、公共德性：助人的内在品质	26
第三节 公共德性：亲社会行为的价值内核	27
一、关联与互动：深层解释与外化标志	27
二、契合与抉择：人与社会的德性契合点	29
三、预防与维持：防止工具效应影响下亲社会行为的 异化可能	30

第二章 公共德性的思想界说：代表观点与思想举隅	33
第一节 西方公共德性思想与观点	33
一、群体与个人：自我澄明中蕴含的公共德性旨趣	34
二、国权与民权：政治理想中蕴含的公共德性理致	38
三、公平与效率：市场经济伦理中蕴含的公共德性意旨	42
第二节 近代中国公共德性探寻之思想理念	65
一、私德与公德：道德转型中的公共德性吁求	66
二、引西与济国：道路选择中的公共德性追寻	69
三、救亡与启蒙：价值探求中的公共德性追求	70
四、历史局限：近代中国公共德性探索的艰难	7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公共德性思想	72
一、公共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体之思与建构之路	72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实践观：实践的公共合理性	76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归宿：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类 生命状态	77
第四节 公共德性的心理学话语	78
一、阿德勒：对公共生活的社会兴趣与心理需求	78
二、格式塔心理学：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80
三、哈特：道德同一性	81
第三章 公共德性的培育思考：怎样增加助人行为？	84
第一节 公共德性培育何以可能：社会条件和制度安排	85
一、制度前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85
二、政策扶植：权力的“公共性”	90
三、社会条件：公共实践	98
四、符号与传播：象征社会“正能量”的互动	106
第二节 公共德性的养成性与可教性	110
一、生活上的德性涵润：公共德性的养成性	110

二、智力上的德性教学：公共德性的可教性	113
三、融通：养成性与可教性的关系互动	122
第三节 公共德性培育的显性与隐性	124
一、“显”“隐”观念的理论分化与定位	124
二、照应：显性与隐性的动态平衡	128
第四节 公共德性培育的现实与媒介	130
一、多维棱镜透视：前网络文化阶段与网络文化阶段	130
二、耦合：现实与媒介的开放推演	134
第五节 元认知：公共德性培育的有所为而为与无所为而为	137
一、公共德性培育“有所为”的逻辑展开	137
二、公共德性培育“无所为”的境界延拓	138
结语	141
参考文献	142

导言 城市社区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发育： 引发对公共德性的关注

作为公共德性中最内核的部分,公共精神是对生活在公共空间中的每个个体的价值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超越性总涉,是孕育于人类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优良品质的内生能量,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意蕴。而从公共德性角度研究城市社区现状不仅可以拓延公共精神的内涵,使对城市社区的研究更有层次感,而且可以从公共德性的导向即亲社会行为出发,使针对城市社区的实证调查更为丰满立体。

一、亲社会行为：为什么人们助人？

社会中时刻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亲社会行为——小到主动关心别人、分享所得、谦让有限资源,大到打击犯罪、慈善捐助、拯救他人生命等。与现在热议的道德滑坡等情况不同,亲社会行为表现着社会中的善举和积极行为,传递的是社会的“正能量”。

“亲社会行为”一词最早出自美国社会学学者威斯伯(Wisbe)发表于1972年的文章《社会行为的积极形式考察》(*Positive Forms of Social Behavior: An Overview*)。目前,被众多学者接受并广泛引用的亲社会行为定义有如下几种:

(1) 艾森博格(Eisenberg)指出,亲社会行为指向一种倾向于使他人得以受益的自愿行为,^①如帮助他人、与他人分享、安慰他人等。

^① [美]南茜·艾森博格. 爱心儿童——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研究[M]. 巩毅梅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6: 3.

(2) 缪森(Mussen)等认为,亲社会行为倾向于助人,或者使某一他人或群体受益,并且行为者本身并不希求获得某种外在的奖励,因此亲社会行为通常需要行为者付出某些代价、作出某些冒险甚至是自我牺牲。^①

(3) 拉什顿(Rushton)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对他人有益的行为,是牺牲自身利益的行为,且并不以此渴求享有任何内部或者外部的奖励,因此也可称为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②

(4) 罗森汉(Rosenhan)等人将亲社会行为归为两类:一类的行为表现是自发的,其行为动机是关心他人;另一类的行为表现是具有常规性的,其行为动机是获得好处,即希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也能够对自身有利,如可以避免惩罚等。^③

(5) 在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中,亲社会行为意指这样的一些行为反应:行为者自身无明显利益获取,但是对接受者而言却是有益的。^④这与缪森(Mussen)和拉什顿(Rushton)对亲社会行为的定义较一致,界定都比较严格。

(6) 黄希庭认为,亲社会行为就是一种能够对他人、对社会有益,并带来积极影响的利他行为、助人行为或者其他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行为,如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分享、谦让、合作、帮助行为,以及为了他人利益而甚至做出的自我牺牲行为等。^⑤

(7) 杨韶刚认为,亲社会行为泛指所有符合社会期望,并且能够对他人、对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⑥

(8) 寇彧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行为,甚至是为了他人利益而自我牺牲,并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和趋向,如谦

① 张宇. 初中生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及学校培养策略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1.

② Perner. Understanding the Representational Mind [M]. Cambridge, MA: Bradford Books/MIT Press, 1991: 24.

③ 迟毓凯. 人格与情境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16.

④ 孔令智, 汪新建, 周晓红. 社会心理学新编[M]. 辽宁: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57.

⑤ 黄希庭. 简明心理学辞典[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284.

⑥ 杨韶刚. 西方道德心理学的新发展[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58.

让、合作、帮助、分享、捐赠等是典型的亲社会行为。^①

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亲社会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本书认为,亲社会行为具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行为的目的必然是对他人、群体或者社会有益的;二是必须是自觉自愿非强迫的行为。

通过上述归纳分析可知,从广义上说,亲社会行为是发生于社会环境中的,符合社会期望的,并且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那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亲社会行为不完全等同于利他行为,事实上,它比利他行为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对“利他”和人道主义行为的研究开始萌芽。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人们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冷漠,激发研究者们探究为何在有的情况下人们会对身处困境之人施以援手,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又表现得那么无动于衷。^②从那时起,人们对亲社会行为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兴趣也越来越高涨。^③

但是,说到对自己善心的了解,人们还是不免觉得自己在亲社会行为方面的知识是如此有限。当然,原因之一是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所进行的许多实证研究,都致力于了解反社会行为形成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因素。通过研究人们的不道德观念与行为,心理学家们试图探明侵犯、冲突、犯罪和偏见等行为的认知与社会基础。与心理学家们对人们负面行为的长期研究相比,他们对分享、合作、利他行为等正面行为研究的历史就要短得多。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的“猎奇心理”,似乎人们对负面行为的关注总是比对正面行为的关注更多些。尽管几个世纪以前,休谟(Hume)等哲学家就对同情心和亲社会行为产生了兴趣,^④但是1970年以前,大多数教育学

① 寇斌,王磊. 儿童亲社会行为及其干预研究述评[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4): 86.

② Latane, Darley.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M]. New York: Appleton, 1970: 12.

③ Hoffman. Developmental Syntheses of Affect and Cogn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ltruistic Motivation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5,11: 607—622.

④ Hume.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35.

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主要是攻击性行为、不良行为等负面行为，而不是亲社会行为。正因为抢劫、偷盗、暴力、不诚实等行为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产生偏见、盲目服从权威、恐怖行动、麻木不仁乃至屠杀无辜人群等行为具有显著的恶性影响，所以研究者们致力于了解并减少这些负面行为，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这些行为确实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理应成为关注的重点。然而，根据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大量活动及行为发生和发展的经验看，它们与相关的激励有着密切的关联，正面激励（即习惯意义上所称的表扬）能使有机体持续相应的正确行为并明确继续努力的方向，而负向评价（即习惯意义上所称的批评）只能使有机体明白什么事情不能干，什么行为不能继续而必须终止，因而它对提示人们行为的前行目标和方向的作用几乎为零。又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一些逻辑学的基本意义时认识到，在作事实判断时，存在两种基本的判断方式，即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任何肯定判断在肯定和确认某个事实的同时，又包含着无数个否定判断，即否认这个判断与无数事实之间的关联；而一个否定判断除了表明它不是指向某个事实之外，不能揭示或明确它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在公共生活不断丰富和充盈的当代，人们除了不能忽视主要起否定性作用的道德批评和道德谴责之外，更应注意道德引导和道德激励，并将关注重点从审视反社会行为转向谋求积极的行为导向和价值推动，给予人们更多的爱心和关心，这样将有助于扩大亲社会行为对人们道德潜能开发的空間。

另一个原因是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及其背后动机的复杂性，因而研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也更为复杂。在公共生活领域，我们怎么来解释如下的现象：人们对发生在自身周围有些似乎应该触人心绪的事件表现出不予关注、冷漠、无同情心的同时，却对另外一些事物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道德关注和体恤行为，甚至做出了一些颇具自我牺牲精神的行为？助人的意愿是否是一种缘于基因的基本冲动？有没有纯粹的助人动机？还是仅仅当人们能从中获得某些利益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帮助？是否有类似马斯洛（Maslow）需求层次的助人动机层次呢？能够维持助人行为的持续性的深层动机是什么？

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不少亲社会行为是被这些因素所触发的：物质

性回报、希望由此减轻内心的不舒服感觉(如不安、负罪感等)、对社会认可的预期等。^①但是亲社会行为还包括利他行为,包括公共的德性,包括更为纯粹的社会高级动机(如平等、公正、义务、包容、共情等),表现为在公共生活中,纯粹由于对他人的恻隐之心,或者是渴望坚守内心深处的道德准则而激发出来的亲社会行为。这种亲社会行为的确比渴望规避惩罚、得到认可或回报的亲社会行为更为可贵。

这种利他行为或者说共情行为、缘于公共德性的行为,它们所产生的原因,与促使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其他原因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了解人们帮助他人的动机,对于我们了解“公共德性”、促进“公共德性”的发育发展和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此,只有当我们了解了人们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动机,并弄清楚这些动机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在各种情形下是如何被激发起来的,我们才能够切中重点、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人们的善良与爱心。

二、公共德性：人的亲社会行为诉求

人类社会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公共性的生活样态,对公共性的澄明和守护,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实质和归宿。对公共性的选择性生成、契合性认定、科学性矫正,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完善和践履。

一方面,就一般理解而言,公共性是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实践的产物。也就是说,公共性的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所体认和占有的,而是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不断凝练、培育才逐步被确立和得以彰显的。公共性的确立必须以个体的自觉和自由为前提。在现代社会之前,绝大多数个体是按照常识、经验、习俗和惯例而自发地生存和生活着,这种境况还谈不上真正的公共生活,也就无公共性可言了。只有当个体超越了纯粹的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积极寻求科学的、自觉的精神再生产,并在公共生活中获得认知和情感的满足,以及自我效能的超越时,真正的公共性才会被确

^① [美]南茜·艾森博格. 爱心儿童——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研究[M]. 巩毅梅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6: 3.

立起来。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亲社会行为的观照历程。

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公共性的产生绝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在要求长期积淀和凝练到一定时段和条件下才逐渐显现的,只是最初的这种公共性因素并不被称为“公共性”而已。至于这种一定时段和条件,是随着人的启蒙和人的解放,在出现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分后才出现的,也就是是在出现了以自主、平等为特征的个体后才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性(包括公共德性)的内涵和适用范围是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的。它本身应该就是这样—个过程,这种过程的开端存在于人们早期社会生活的交往中。原始社会中的原始共产主义可以被看作类似公共德性的早期形态,当时人们都奉行它。但这种所谓的、当时存在的“公共德性”实际上通行(即发生作用)的范围十分狭窄,只是在人数不多的本氏族或本部落中实行,一旦越出这种以血缘关系所维系的族群范围,族群之间就可能为了争夺一块水源或草地而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争斗,即无所谓“公共性”了。所以说当时也有“公共性”,但其内涵与今天所说的公共性之内涵已不可相提并论,但今天的“公共性”可能蕴含着人类早期原始“公共性”当中的某些基因,它们也许就是从那里发育过来的。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公共生活的领域不断扩展和深化,于是公共德性的内涵和通行范围也不断拓展,它们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或赞同。如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形成了某种城市精神和公共德性,包括古希腊的四大美德,其价值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尽管“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的内涵与今天人们谈论这些词语时所理解的内涵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至少这些概念的外部性是被今人所接纳的。所以,公共德性怎样从古代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不同历史时期又有怎样的特点和作用,实际上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由此可见,亲社会行为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公共性逐渐呈现的过程,它直接推动了人类公共生活的开展和丰富。经济的发展,在相对意义上使人们解脱了来自私人领域事务的束缚,人们开始有条件在从容追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的基础上,谋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并推动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为先导的资本主